

# 編後語

本期是俄羅斯專輯。歷史上，中蘇兩國都是共產黨執政、具有高度集權體制的社會主義大國。自從蘇聯解體，俄國從一個長期與美國分庭抗禮、主宰世界的強國迅速淪為政治經濟弱國後，某些中國人甚至不願意去了解其前因後果，就把俄國作為反面教材。但是，如何理解蘇聯解體並關注90年代至今的俄國社會究竟發生了甚麼樣的變化，卻正是把握中國未來的變革和二十一世紀世界發展方向的不可忽視的重要視界。

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有四位西方學者從不同角度評介當代俄國。由於同時全面推開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大變革，拉特蘭勾勒出從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到普京的俄羅斯政治轉折，是如何由一個無政府與威權主義的危險混合體，發展到今天的超級總統制。格沃斯捷夫用「受管制的多元主義」、「垮掉的超級大國」和「衰敗了的強權」來形容當代俄國，文章生動地描述了普京如何在這種現實下，調整其國內及外交政策和目標。馬什比較了中俄改革基礎的差異，指出今天的俄國社會雖然完成了與舊體制的決裂，但民眾普遍的懷舊情緒表明，要實現民主自由和經濟繁榮的雙重目標，仍是艱難旅程。中俄兩國的改革，都有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困境，季米特洛夫用聯邦制理論框架，比較分析中俄在國家構成、制度及實踐上的異同，以及社會分配嚴重不平等和貪污腐敗等問題。編者要特別感謝拉特蘭教授為本刊撰稿並共同策劃這一專題。

在以上一組評論中，四位作者都肯定了俄國近幾年經濟恢復快速增長和政治趨於穩定，也指出替代馬列意識形態的並不一定完全是西方式的，統一俄羅斯黨接過一百年前斯托雷平的口號：「你們需要偉大的劇變，我們則需要偉大的俄羅斯。」從張建華和朱建剛兩篇文章，則可以看到二十世紀初期俄國自由主義派知識份子，是怎樣反思1905年和1917年的兩次革命，他們在追求國家穩定與自由價值的統一的目標下，從激進左傾轉向保守自由主義。值得注意的是，俄國知識份子不僅僅是思考者，而且是積極參與現實政治的行動者。孫傳釗評介塔爾蒙《極權主義民主的起源》一書，亦可以配合閱讀。車臣問題是當前俄國最難解之結，侯艾君詳細剖析二戰後期蘇聯政府流放車臣人的原因、經過及後果；鄭羽分析冷戰結束後中美俄三國關係的演變及其非對抗性、非全局性等特點；岡察洛夫和李丹慧討論2001年中俄兩國簽署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中有關兩國「相互沒有領土要求」的條款，特別是毛澤東1964年發表中國要算150萬平方公里「領土帳」的談話背景；都有助我們了解俄國與世界的關係。

此外，曹立新和李金錚兩篇文章都是評介20、30年代晏陽初等知識份子在定縣推行的平民教育實驗，以及為提升農民的文化和公民意識而辦的《農民》報，他們以何等的努力來落實改造中國的理想抱負。由此可見，在二十世紀前半葉，中國知識份子是具有積極思考和社會參與能力的階層。